

## 數字卦與陰陽爻

李宗焜\*

傳世及出土的古文物銘識中，有一種由數字組成的符號，歷來對此符號有各種不同解釋。

這種由數字組成的符號，現代學者們稱之為數字卦或筮數。張政烺先生依「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把數字卦逐譯為《周易》的易卦，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並加以推演。

數字卦最初是由一到十的數字組成的，到戰國楚簡以一、六、八居多，王家臺秦簡只剩一、六、八，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則只有一、八，一演變為陽爻，八拉平之後，就變成陰爻，於是有了由陰陽爻組成的易卦。也就是說數字卦是易卦的前身，易卦是由數字卦一脈相承演變來的。這是目前絕大多數學者對數字卦與易卦關係的認識。

本文全面搜集有關數字卦的材料，對目前幾乎「定於一尊」的說法重新加以檢討。經過仔細論證，認為把數字卦逐譯為《周易》易卦，局限性非常大，與相關文獻如《左傳》、《國語》等的易例也不相應；所有在數字卦與《周易》關係上的推演，主觀成份居多。

本文詳細論證：數字卦與易卦，是並存的兩個不同的系統，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一脈相承的關係。許多學者根據數字卦逐譯為《周易》易卦的做法，利用《周易》文字作許多的推演。如果數字卦與《周易》關係的基礎動搖，這些推演也就面臨重大的考驗。

關鍵詞：數字卦 易卦 周易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前言

今本《周易》的易卦由「--」、「—」（也就是陰陽爻）組成，這是大家熟知的。然而隨著考古材料出土日多，研究日益深化，這個問題似乎沒有那麼簡單。

首先是陰陽爻的起源問題，它是原本就這個樣子，或者是由什麼東西演變而來？近來學術界普遍認為易卦的陰陽爻是由數字變來的，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有待進一步釐清。

近來考古出土的《易經》材料不少，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寫本、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的竹簡《周易》，以及王家臺秦簡的《易經》寫本，其卦畫究竟是陰陽爻還是數字，學界也有不同意見。時代往前到戰國時代，楚簡上的卦畫究竟是數字，抑或是陰陽爻，也都有爭論。時代更早的周代青銅器，甚至商代的甲骨文，也都出現由數字組成的符號，它們跟易卦的陰陽爻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錯綜複雜，學界意見至為分歧。本文試圖從眾說紛紜中，對此問題作一深入探討。

## 二、數字卦的解釋

### （一）略說數字卦

在出土與傳世的古文物銘識中，有一種由數字組成的符號，歷來對此符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宋朝王黼的《宣和博古圖》，收錄北宋年間出土的「南宮中鼎」（下文所引的相關論述中或稱「中鼎」或「中方鼎」），是這類數字符號的最早著錄。

此鼎銘文的最後一段是「惟臣尙中臣」，底下則是一串符號，（圖一）《博古圖》釋作「赫赫」，<sup>1</sup> 王球《嘯堂集古錄》釋作「十八大夫八大夫」，<sup>2</sup> 薛尚

<sup>1</sup> 王黼，《宣和博古圖》（以下簡稱《博古圖》，明萬曆十六年泊如齋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二，頁17。該書作者，葉國良認為：如果

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隸定作「赫赫」，並解釋說：「後云『惟臣尚中臣赫赫』者，如『赫赫師尹』之義」。<sup>3</sup> 郭沫若以爲「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sup>4</sup> 唐蘭認爲「宋人把它們釋成赫字是錯的。按銅器銘刻的一般規律，這兩個字在銘文最後，應該是氏族的名稱」，並結合若干有此類「符號」的甲骨、金文，進一步指出「這種文字是用數目字當作字母來組成的」。<sup>5</sup> 唐蘭指出「用數字構成」，比起宋人的解釋，無疑是一大進步。

除了青銅器和殷墟甲骨之外，周原甲骨也有類似「用數字構成」的符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討論會上，徐錫臺介紹了這些「奇字」，隨後張政烺先生作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講話，指出這類「由數字組成的符號」與八卦的關係，認爲它們是一種占筮的記錄。三個數字組成的是單卦，六個數字組成的是重卦。按照「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的原則，把數字符號巧妙地轉換成《周易》的卦畫。後來張先生又有多篇論文闡述這個主張，<sup>6</sup> 主要意見是：這些組成數字卦的數字，是從商周時期由一到十的數字組成，經由戰國時期向一、六、八集中，變成漢初的一、六，<sup>7</sup> 再變爲陰陽爻，前後一脈相承。對兩組數字卦並列的情形，則解釋爲「由某卦之某卦」的「變卦」。

張先生的解釋，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自此之後，凡討論數字卦的，無不受張先生影響，或完全接受張先生的主張。

根據張先生的說法，則前面提到那件宋人著錄的南宮中鼎，銘文最後被解釋爲「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的符號，便是由數字「七八六六六六」、「八

考慮它的修撰過程，不如題「宋徽宗敕撰」為宜，見所作〈《博古圖》修撰始末及其相關問題〉，《幼獅學誌》18.1(1984)：130-142。

<sup>2</sup> 王俅，《嘯堂集古錄》（據上海涵芬樓借景蕭山朱氏藏宋刊本重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卷上。

<sup>3</sup>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刻宋本，北京：線裝書局，2001），卷一〇。

<sup>4</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16。

<sup>5</sup> 唐蘭，〈在甲骨文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2。

<sup>6</sup> 如：〈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4；〈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北京）24(1985)；〈易辨〉，收入《中國哲學·第十四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以上各文均已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sup>7</sup> 此是指數字出現的頻率以一、六最多。之後學者的論述則以一、八為易卦的前身。

七六六六六」組成的易卦，按照「奇數為陽爻，偶數為陰爻」的原則，這兩組數字卦便是易卦的「䷁」（即坤下艮上的「剝」卦）和「䷁」（即坤下坎上的「比」卦）。兩者的關係是卦變，依《左傳》、《國語》之例，即是「遇剝之比」。

李學勤先生曾討論這個數字卦說：

此例遇剝之比，剝為本卦，比為之卦，係五、上二爻變，而《左傳》、《國語》並無二爻變筮例。宋代朱子云：「兩爻變，則以本卦爻占，仍以上爻為主。經傳無明文，以例推之當如此。」<sup>8</sup> 按一爻變者，原則上以本卦變爻辭占，《左傳》共有八例，其間只有兩例兼以之卦變爻辭或本卦、之卦卦辭占，所以朱子的類推是合理的。我們看方鼎本卦是剝，兩變爻是：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李先生並進一步根據《周易》爻辭，認為這是大吉大利的卦，所以「中把這一占筮鑄於彝器，是合乎情理的」。<sup>9</sup>

南宮中鼎「數字卦」所在的位置，在銘文之末，合乎一般族徽位置的常例，以致郭沫若等有族徽之說。張政烺先生雖然提出其為數字卦，並與易卦連繫，但仍未完全放棄「族徽」說，認為數字卦與作邑有關，「作邑曾經占過卦，用卦名來稱呼新邑」、「卦和采邑是分不開的，卦是采邑的名字，因此也就成了新加的族徽」。<sup>10</sup> 關於數字卦與作邑的關係，學者較少認同，此不具論。

## （二）數字的變化與陰陽爻的產生

郭沫若、唐蘭等人把數字卦說成族徽或氏族名稱，現在已很少人接受這種說法，但唐蘭指出「族徽」是由數字組成的，則是一大創獲。張政烺先生更匯集甲骨、金文等三十二條材料，統計了從一到八各數字出現的次數，「看到六字和一

<sup>8</sup> 按：此段文字出自朱子《易學啟蒙》（收入《朱子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第12冊），卷四。

<sup>9</sup> 李學勤，〈中方鼎與周易〉，收入氏著，《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頁153-160。

<sup>10</sup>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字出現偏多，而六字尤占絕對多數的現象」。<sup>11</sup> 並指出「陽爻是由『一』字，陰爻是由『六』字變來的。到東漢末熹平石經《周易》，陰陽爻都寫成極整齊的長短橫畫，流行至今」，<sup>12</sup> 也就是說「一、六就是陽爻、陰爻的前身」。<sup>13</sup>

其後學者對此進行統計的頗不乏人，所收集到的材料也增加到超過一百例。如韓自強先生從一百零二個數字卦中，對古人使用數字出現的頻率做了統計，時代上從商代、西周到戰國，材料則包括甲骨、銅器、陶器、玉器、天星觀楚簡、包山楚簡等，詳細列表統計，並做出結論表示：

從上面所列數字卦例使用的數字頻率可以看出，商代和西周使用的都是一、五、六、七、八、九這六個數字，所不同的是商代使用頻率最多的是六、七、八，其次是一、五、九；西周使用頻率最多的是六、八，其次是七、五、九；到了戰國，天星觀楚簡用的是一、六、八、九；包山簡用的是一、五、六、八，用的都是四個數字，兩處楚簡使用頻率最多的是六、八，其次是五、九。值得注意的是江陵王家臺秦簡已從楚簡用四個數變為三個數，而這三個數正是楚簡使用頻率最多的一、六、八。……秦簡出現一、六、八三個奇偶數字不等的卦畫，可以視為從楚簡用四個數逐漸演變為用二個數字的中間過渡階段的現象。

總之，數字卦這種占筮術從商周到漢初，延綿兩千多年，在流傳過程中由繁趨簡。從原始的一至九，九個數字皆用，演變成用六個數字，五個數字，四個數字，三個數字，直到使用二個數字，就是《周易》所謂的「簡易」。<sup>14</sup>

季旭昇先生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說：

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數字卦，一直到商、周、秦、漢，我們看到它所用的數字大體上是朝向簡化的方向走，因此先是新石器時代的兩個數字卦十<sup>15</sup>個數字中就用了「一、二、三、四、五、六」等六個數字，到商代基本上

<sup>11</sup>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sup>12</sup> 張政烺，〈易辨〉。

<sup>13</sup> 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3。又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頁680-691。

<sup>14</sup>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63-132。二〇〇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韓先生以「阜陽漢簡《周易》研究」為名的專書，書中收此文，與刊在《道家文化研究》者為同一篇文章。

<sup>15</sup> 原稿作「十二」，疑「二」衍。

是以「六、七、八」為大宗，春秋、戰國時代則向「一、六、八」集中。

到西漢時期的馬王堆帛書和阜陽漢簡《周易》，全以「一、八」來表示。

「一」與陽爻同形，「八」拉平之後與陰爻同形，這就和現在所見的《易經》完全一致了。這說明了《易經》源於數，《易》卦也是由數變來。<sup>16</sup>

最近，蔡運章的論文宣稱筮數卦例有兩百多個，並指出：「這些筮數譯成易卦後：一是它們的名義與其載體的名義或用途相合，二是它們的名義與其卦辭的含義相符，三是它們與其在《周易》中的卦名、卦象甚至卦爻辭的含義相類。也就是說，這些筮數譯成易卦後，按其在《周易》中的卦名、卦象、卦爻辭來理解，都與其載體的名義、用途及卦辭的含義若合符節。」<sup>17</sup> 雖其所說各例皆頗穿鑿，卻是堅信筮數與易卦及其文字密不可分的关系。

綜合以上的說法，數字卦是由一到十的數字組成，以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的原則，可以與易卦相對應。這些數字慢慢向一、六、八集中，最後只剩下一、八（張說一、六），再分別變成陽爻和陰爻，也就是說一、八是陰陽爻的前身。<sup>18</sup> 兩組數字卦同時出現，就是《左傳》所說的本卦和之卦。

### 三、數字卦說解的省思

自從張先生把數字卦和《周易》易卦巧妙聯繫起來之後，此說風行草偃，信從者眾，由數字卦逐步發展成為易卦陰陽爻，更是多數學者共同的認知。在張先生之後，雖有學者陸續在這個問題上做研究，但大都只是材料的增多，主要的論點，並沒有超出張先生的範圍之外，這種說法也就成了絕大多數學者的共同看法。但我們對這樣的說法，卻感到不是十分放心。

<sup>16</sup> 季旭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經學研究會主辦，「《周易》《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年5月8-9日）。又收入《象術易學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3），第三輯。

<sup>17</sup> 蔡運章，〈商周筮數易卦釋例〉，《考古學報》2004.2。本文承顏世鉉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sup>18</sup> 李零也認為雙古堆、馬王堆的《周易》易卦是由一、八組成的，且認為「用一、八表示的卦爻，即今本《周易》卦爻的前身」。見氏著，《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258。在《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中則認為從戰國以來到宋以後的易卦，都是由數字一、八組成的。

## （一）數字卦與易卦的關係

數字卦的數字，依「奇數爲陽，偶數爲陰」的原則，固然不難對應出易卦的卦名，但以此方式，「一六八」對應出來的是「䷎」（艮），同理，「五六八」或「一八六」等對應出來的也都是「艮」。以《周易》而言，既皆是「艮」，則不可能有任何差異，但從數字卦而言「一六八」與「五六八」、「一八六」等，卻不應無別？可見把數字卦對應於《周易》的易卦，是有局限性的。

安陽殷墟發現的商末卜甲，其上有「七七六七六六」的數字卦，<sup>19</sup>（圖二）依現代學者的說法，可對應出《周易》的漸卦；安陽殷墟出土的商末陶爵範，其上一數字卦是「一七六七八六」，<sup>20</sup>（圖三）依同樣的原則，也是《周易》的漸卦。從《周易》看都是漸卦，便絲毫無別；但從數字卦看，「七七六七六六」和「一七六七八六」，道理上不應該完全一樣。

從各種歸納分析的統計表來看，各個時期的數字卦數量並不多，以如此少的「樣本」，而要歸納出數字「集中」的傾向，似乎不是很具代表性，何況「傾向」之外，仍有爲數不少的例外。這樣的結論，恐怕未必能說明問題。從筮法的角度看，某些數字出現的頻率較高，某些數字出現的頻率較低，這是很正常的機率問題，即使楚簡數字卦中，明顯的一、六、八居多，畢竟天星觀楚簡仍有「七」、「九」的例外，包山楚簡和新蔡葛陵楚簡都有「五」的例外。

## （二）數字卦與易卦的區別

目前所見的百餘個數字卦，其數字以一、六、八居多，但無論其他數字所占比例多低，這些例外數字的存在，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今所見各種寫本的《易經》，其卦畫情形卻與此不同。下面是幾種《易經》寫本的卦畫，和相關學者的說明。首先談兩種漢代寫本：

一九七七年西漢汝陰侯夏侯竈墓中出土的阜陽漢簡《周易》，包含五個卦畫，還有卦名、爻題、卦辭、爻辭等內容，是形式完整的《周易》寫本。僅存的五個卦畫是䷍（大有）、䷌（林）、䷔（賁）、䷛（大過）、䷝（離）。（圖四）主持發掘的韓自強先生說：「這五組卦畫裏被稱爲陰爻的都寫成八字形，與

<sup>19</sup> 肖南，〈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考古》1989.1。

<sup>20</sup> 黃濬，〈鄴中片羽二集〉（北平：通古齋，1937），卷上，葉47。

同墓出土的數字如年表中的八字的寫法完全相同。這裏的陰爻是八字無疑。《周易》卦畫的陰陽爻應是八、一兩個數字所組成。」<sup>21</sup>

一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帛書《周易》，該抄本抄寫於漢文帝初年，六十四卦的卦畫分別以「—」、「𠄎」代表陽爻和陰爻，（圖五）也就是學者所說的，數字卦集中到最後只剩下一、八，一變成陽爻「—」，把八拉平之後就變成陰爻「--」。

接著談王家臺秦簡。

一九九三年三月，湖北江陵荊州鎮王家臺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易占〉一篇，荊州地區博物館發表的簡報說其格式是先有卦畫，卦畫後是「卦名曰」、「卦畫是以一表示陽爻，以六或八表示陰爻」。<sup>22</sup> 學者認為王家臺秦簡為三易中的《歸藏》。<sup>23</sup>

以上這些《易經》的抄本，包含《周易》與《歸藏》，其陰陽爻都由「—」、「^」或「^」（包括𠄎）組成，毫無例外。但是否就如多數學者所認為的，數字卦向一、六、八集中，從有例外到完全沒有例外的一脈相承呢？

我們認為這種「一脈相承」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這一類數字卦和易卦，其每爻所出現的數字或符號，其產生的背景，到底是隨機的「機率」？還是主觀的「選擇」？這是首先要釐清的問題。

韓自強先生在統計各種數字卦的數字出現頻率後，說：從原始的「一」至「九」九個數字皆用，演變成用六個數字、五個數字、四個數字、三個數字，直到使用兩個數字，這就是《周易》所謂的「簡易」。<sup>24</sup> 這種說法顯然是有問題的，「出現」多少數字跟「使用」多少數字當然不是同一回事，「出現」是機率，「使用」則是選擇。我們可以說包山楚簡的數字卦中出現過一、五、六、八這四個數字，卻不能說楚人選擇了這四個數字來占筮，這是很明白的道理。否則時代相彷彿的天星觀楚簡，何以又選用一、六、八、九，這又蘊含什麼不同的文

<sup>21</sup>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63。

<sup>22</sup>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1。

<sup>23</sup> 如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收入《一劍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八屆畢業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頁101-112；李家浩，〈王家臺秦簡「易占」為《歸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1：46-52；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發表於北京大學主辦，「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8月19-22日）。

<sup>24</sup> 參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此處引文稍有節略。

化背景？從數字卦來看，雖然一、六、八居多，但其他數字仍有出現，<sup>25</sup> 則數字的出現顯然是「機率」問題，不是「使用」。

所有數字向一、六、八集中，最後變成一、八，這種「一脈相承」的說法，另有一個「時代銜接」的問題。根據發掘者的報告，王家臺秦簡的時代「不晚於秦代」，距離漢初的阜陽雙古堆漢簡與馬王堆帛書《周易》，時代上極為接近，卻能有這麼大的轉變。韓先生意識到「從秦簡的一、六、八變成漢初的一、八，演變過程的時間似乎有些短促」，解決的辦法是「把戰國中晚期的時間也算在演變過程，就不會顯得短促了」，並把秦簡出現一、六、八的三個數字，「視為從楚簡用四個數逐漸演變為用二個數字的中間過渡階段的現象」。但這樣的說法仍然無法解釋何以選用一、六、八或一、八的理由。如果易卦出現的數字也跟其他數字卦一樣是機率問題，機率儘管有高低，而說六十四卦均只出現一、八，其他數字絕不出現，這樣的機率未免過於神奇；若說一、八是出於選用，選用這兩個數字難道是出於完全的主觀？《周易》爻題每稱九、六，何以易卦卻「選」一、八？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周易》的卦畫和卦爻辭，應該完成於殷末周初。<sup>26</sup> 如果當時的易卦是像現在所看到的數字卦一樣，由一到十的數字組成，那麼它的組成就絕不止六十四卦，除非真的像現在理解的那樣，先經過「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方式處理過，但這樣處理的結果是用什麼方式記錄呢？如果仍用一到十的數字，何以《周易》相關文字中，對此等數字，都沒有解釋？古書傳抄的過程固然容易產生一些錯誤，但如果說由周初一到十的數字組成的卦，抄到漢初變成只剩一跟八，而且毫無例外，也太不合理。若真如學者所言，經過向一、六、八集中的過程，是什麼樣的方式讓數字向一、六、八集中的？集中的根據或標準是什麼？這些都是很難理解的。總不能說同一部《周易》，在不同時代，選用不同數目的數字來占吧？

如果周初的易卦就是由「一」跟「八」兩個數字組成，而易卦與數字卦關係又是如此密切，依事務由繁趨簡的原則，何以到戰國的楚簡還有一、五、六、

<sup>25</sup> 在現今可見的百餘個數字卦中，二、三、四這三個數字從不出現，張政烺先生認為一、二、三、四皆積橫畫為之，容易混亂不清，於是「二、四變為六，三變為一，所以六和一這兩個數目字在卦爻裏就特別多了」。見〈帛書六十四卦跋〉。

<sup>26</sup> 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311-313。

八、九等數字組成的筮卦？因此要說馬王堆帛書或阜陽漢簡的《周易》上所看到的卦畫（所謂「一、八」），是由戰國或秦的「一、六、八」簡化而來，似乎有時代上的矛盾。

### （三）王家臺秦簡與一、六、八的「過渡」問題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北京大學舉辦「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王明欽先生在會中發表了〈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除了依據王家臺秦簡的內容，把「易占」定名為「歸藏」外，也論定《歸藏》「形體最古，接近楚簡文字，應為戰國末年的秦簡抄本」，可知此抄本的時代與包山楚簡等時代相去不遠。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說「在這批竹簡中，共有七十組卦畫，其中十六組相同，除去相同數，不同的卦畫有五十四種，卦畫皆以—表示陽爻，以^表示陰爻」，（圖六）並寫出這些卦畫及其內容。這五十幾個卦畫，明顯的如王先生所說「以—表示陽爻，以^表示陰爻」，取代了之前簡報所說的「以六或八表示陰爻」，不只省去了「八」，也不說「以六表示陰爻」，這個改變非常值得注意。

如前所述，大部份學者把王家臺秦簡的「一、六、八」作為由戰國楚簡的四個字到漢代簡帛的二個字（一、八）的「過渡」，假使王家臺秦簡如發掘者王明欽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所言「以—表陽爻，以^表陰爻」，那麼這個「一、六、八」的跳板隨即落空。如何從戰國楚簡的一、六、八（外加例外的五、九等），直接跳到漢初的「一、八」，恐怕不是如韓先生所說「拿掉六」這麼簡單而已。退一步說，即使勉強把王家臺的—和^說成數字「一」和「六」，它如何變成漢初的「一、八」？除非改弦更張說是「把六換成八」！

個人不認為王家臺秦簡易卦是由一、六、八組成，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卦數問題。大家都知道《易經》系統儘管有不同版本，但「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並無差異，王家臺秦簡的發掘者也認為該簡《歸藏》有六十四卦「是比較可信的」。大家都知道，八卦的三爻由陰陽二爻隨機組合，單卦為八，重卦則為六十四個。無論如何，易經系統都必定剛剛好六十四卦。假使真如一般所言，王家臺秦簡的易卦由一、六、八這三個數字組成，則每一爻可能出現的「數字」就有三種，即應有二十七個單卦，而重卦的數目更遠超過六十四個。事實是，王家臺《歸藏》仍是六十四卦。



#### （四）上博楚簡《周易》與數字卦

王家臺秦簡的易卦，由發掘者最新公佈的材料看，其陰陽爻由「—」、「八」組成固已昭然。最近《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sup>27</sup>的出版，其中《周易》一篇的內容、形式，完全是今本《周易》的面貌，<sup>28</sup>其易卦尚存二十五個，均由「—」和「八」組成，（圖七）無疑的是陽爻和陰爻，而不是數字一、八。<sup>29</sup>這個現象說明了《周易》的易卦是由陰爻、陽爻組成，不是由數字卦變來的。

天星觀、包山、葛陵諸楚簡均出現數字卦，其時代約在戰國中晚期。根據報告，包山楚墓下葬的絕對年代為西元前三一六年，<sup>30</sup>葛陵楚墓絕對年代為西元前三四〇年。<sup>31</sup>天星觀一號楚墓「下葬年代應晚於公元前三六一年，而在公元前三四〇年前後」。<sup>32</sup>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據科學實驗報告，「標本的年代在戰國晚期」。<sup>33</sup>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出現數字卦的楚簡，和《周易》寫本的楚簡，其時代是相近的。

張政烺先生認為「戰國後期《周易》已經成書，和今本無甚差別，這是下限。上限當在春秋晚期」。<sup>34</sup>也就是說和今本無甚差別的《周易》，其時代斷限應在戰國時期，上博楚簡《周易》足以印證此說，其易卦自為陰陽爻。然而戰國楚簡如包山、葛陵等，所看到的卻是與易卦形式大不相同的數字卦！

楚簡數字卦的數字或「一、六、八、九」（天星觀），或「一、五、六、八」（包山和葛陵），與數字卦同時出現的文字，都是占卜事件的記錄，而不是解釋數字卦的內容。時代相近的楚簡《周易》，其文字內容都是解釋易卦的，與

<sup>27</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sup>28</sup> 證明張先生所說：「與今本無甚差別的《周易》，在戰國時代已成書」，是可信的。

<sup>29</sup>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的「說明」指出「以「—」表示陽爻，「八」表示陰爻。這一形式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承之，與王家臺秦簡、今本卦畫不同。」（頁133）本文認為，「說明」中提到的幾種《易經》，其表示陰陽爻的形式儘管稍有不同，但其用意只在區別陰陽的作用則並無差別。「說明」指出「—」、「八」為表示陰、陽的卦畫，不是數字一、八，則十分正確。

<sup>30</sup>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33。

<sup>31</sup>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頁181。

<sup>32</sup>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1。

<sup>33</sup> 據上海博物館竹簡樣品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超靈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測年報告。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中，陳雙君的〈序〉和馬承源的〈前言〉。

<sup>34</sup> 張政烺，《易辨》。

數字卦楚簡的內容有根本的差異；其卦畫由「一」（陽爻）、「八」（陰爻）組成，不是數字一、八，更沒有「一、八」以外的任何數字。「數字卦」與「易卦」的時代相近，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易卦的所謂「一、八」，並不是由數字卦的「一、六、八」進一步集中之後演變來的。否則從數字卦出現的「一、六、八、九」或「一、五、六、八」，如何能同時變成易卦的「一、八」？無獨有偶的，王家臺秦簡也是戰國末的寫本，由「一」、「八」組成陰陽爻，將如何從這個「演變系統」中找到位置？即使把陰陽爻說成一、六，兩個時代相仿的《易經》寫本，竟然一為「一、八」，一為「一、六」，難道是從包山等楚簡的「一、六、八」中，一取其「一、八」，一取其「一、六」？

如果易卦的所謂「一、八」真由數字卦變來，漢初各種《易經》寫本已均是「一、八」形態，何以時代上「下迄西漢晚期」的四川理縣出土的雙耳陶罐，還出現「一八七一八九」的數字卦？<sup>35</sup> 除了一、八，還有七、九。這個晚出的陶罐數字卦，似乎反對了易卦由數字卦變來的時代進程，也反對了戰國時代數字向一、六、八集中進而只剩一、八的說法。<sup>36</sup>

## （五）易卦與數字卦的性質不同

從所有的數字卦看來，多數沒有任何文字說明，有文字的也不是解釋數字卦的意義。而所有「易卦」的寫本，不論《周易》（如阜陽漢簡、馬王堆帛書、楚簡）或《歸藏》（王家臺秦簡），毫無例外的都是由陰陽爻組成，而且同時出現的文字都是說解易卦的，與數字卦的性質明顯不同。這些寫本的《周易》，形式、內容上與今本並無大異，很難說其文字為《周易》，而其卦畫又為今本易卦之前身！再加上楚簡的數字卦和易卦幾乎出現在同一個時代，以及西漢晚期仍出現數字卦的情形，我們認為數字卦和易卦是兩個不同的系統，兩者並非一脈相承的關係，易卦的陰陽爻，也不是由數字卦變化而來。

<sup>35</sup> 此雙耳罐為墓葬的隨葬品，考古工作者認為：「從出土文物看來，這批墓葬的時代，上起秦統一巴蜀之後，下迄西漢晚期。」見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353。又，李學勤〈理縣一帶發現的一件雙耳陶罐〉，認為其時代「估計為西漢前期是有可能的」。見氏著，《周易經傳溯源》，頁173-178。

<sup>36</sup> 張政烺先生以為「秦漢時期《周易》已經成熟，而邊遠地區還有這樣筮法存在，它可能就是《歸藏》尚待考查」。見〈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或有學者但見《周易》易卦作「—」、「--」狀，始見於漢末熹平石經，以爲易卦由一、八變成陰陽爻始於此，而今本《周易》的形式，至此方告完成；甚至這種吸收陰陽學說的符號，必須要遲至東漢末年才能完成。我想這是一種誤解。所見「最早實物」，未必真代表「最早」，如眾所週知，甲骨文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文字，但絕不是說甲骨文之前中國沒有文字；同樣的道理，陰陽符號始見於熹平石經，<sup>37</sup> 也不必然意謂熹平石經之前絕不存在陰陽符號。況且，陰陽學說經過戰國時期鄒衍的大力提倡，漢人解經、講災異，更動輒引以爲說，陰陽學說在戰國、秦漢時期大行其道，在此時期存在陰陽爻的易卦，是合乎情理的，不必遲至東漢末年。

換個角度看，如果陰陽符號必須等到「東漢末年」才能完成，那麼，在「商周」時期即無此種符號，當時的數字卦，當然也就沒有陰陽符號可以對應！這對於主張把數字卦變換爲陰陽爻組成的易卦，在時代上正是一種矛盾。而依學者論述，數字卦變爲陰陽爻的方式是「奇數爲陽，偶數爲陰」，是「奇偶」問題；但持此論者，同時又說陰陽爻是由一、八的字形變來，則又是「字形」問題。這中間的矛盾，持論者似均未曾措意。

#### 四、「數字」和「陰陽爻」的異說

前面詳細論述了易卦不是數字卦變來的，而戰國秦漢時期簡帛寫本的易卦是陰陽爻。拙見與時下流行的說法，有很大的不同。事實上，張政烺先生的說法提出後，影響很大，景從者多；但也偶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只是爲數既少，影響亦較小，所持論證，也有未洽處。這裏只舉兩種比較特殊的說法：一是所有數字卦都是陰陽爻，二是所有陰陽爻都是數字卦。

李學勤先生過去曾支持張先生的說法，但最近有一個新的看法，把許多數字卦都說是陰陽爻；但其做法並不是如張先生用「奇數爲陽，偶數爲陰」的原則，把數字卦轉換爲易卦，而是直接從數字卦的字形上分析，認爲它們是陰陽爻而不是數字。

李學勤先生在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年誕辰的研討會上，把楚簡的筮數都說成卦畫。他說：

<sup>37</sup> 即使如一般理解，不認爲戰國秦漢各種寫本易卦爲陰陽爻。

這兩批簡（按指天星觀和包山楚簡）的所謂數，除「一」以外，都與簡中常見的數字形體不合。

所謂「五」，僅見包山簡229，（圖八）作兩斜筆上部交叉，而包山簡其他「五」字皆有上下兩橫。

所謂「六」，作兩斜筆上端相連，其他「六」字均有四筆。







所謂「七」，僅見天星觀簡150，<sup>38</sup> 作兩斜筆上部交叉，左一筆較右筆為短，其他「七」字為一橫一豎兩筆正交。

所謂「八」，多係兩斜筆上端略分，僅包山簡245有一處和其他「八」字相似。（圖九）

所謂「九」，僅見天星觀簡45，諦視恐係「一」，同其他「九」字相異。值得注意的是，「五」、「六」、「七」、「八」實際上都是由兩斜筆組成的。……

我認為，這些所謂筮數事實上只包括兩種符號，一種是一橫筆，有的稍長，還有的略歪；另一種是兩斜筆，有的上連，有的交叉，有的分開。這並非數字，而是卦畫。

卦畫，如眾所習知，有「—」、「--」兩種，一陽一陰。竹簡非常狹窄，又要駢書兩行，所以把「--」改為兩斜筆，以避免誤連，至於是連是分，或者略有交叉，信筆所之，就無須細計了。<sup>39</sup>

李先生認為楚簡五、六、七、八諸字都不是筮數，而是卦畫的陰陽爻。他對這些數字的分析，恐怕是有問題的。如包山楚簡210的「」（六）、「」（八）同見於一卦，（圖一〇）字形上的不同顯然是有意的區別。河南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的竹簡，其「乙四79」的「八」字作「」，（圖一一）刻意作分開的折筆，顯然也是為了與見於同卦的「」（六）有所區別；「乙二2」的八字作「」折筆更為明顯，（圖一二）顯然不是李先生所說「兩斜筆上端略分」的現象，都不應該把它看作與同卦出現的「」只是無須細計的信筆所之。

<sup>38</sup> 天星觀楚簡並未發表，據云只有摹本。此應是作者根據摹本或實物而言。

<sup>39</sup> 李學勤，〈出土筮數與三易研究〉，發表於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主辦，「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1999年10月）。後收入氏著，《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390-396。最近李先生發表〈論戰國簡的卦畫〉（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5），對此問題的看法並無改變。此二文分別收入氏著，《周易溯源》（四川：巴蜀書社，2006），第四章的第三節和第四節，頁273-284。

龍師字純認為一到十的數目字「本是純粹約定的指事符號」，並分析說：

就字形分析之，其始五字作x，六字作^，七字作十，八字作八，九字作乚，十字作丨，少則一畫，多則二畫。…其後變x為ㄨ，是為避免與七字、甲字的可能相混；改^為∩，由直筆而折筆，疑求與入字區別；再由∩而演變為介。<sup>40</sup>

明白指出五、六、七、八諸字雖是由兩筆組成，但經由不同的構成方式，分別為不同的字；對文字形成的背景，顯然分析得非常深刻。進一步說，文字自有其演進過程，但即使同一時期，二形並見的情況也是存在的，如「六」字甲骨文習見，一般作介，但在兆序則介、^並見，甚至^出現的頻率還更高，不能以之與其他作四筆者不同而謂其非「六」字。從楚簡的數字卦看來，其由數字組成是無庸置疑的。如果只是為了取與陽爻的「一」有別，又何必在同一卦中使用那麼多不同的符號來表示陰爻？又如果「一」以外的其他數字都解釋為與「一」相對的陰爻，其他甲骨、金文等所見的數字卦，其情況與楚簡並無差別，也都應視為陰陽爻組成的卦畫，那麼現在可見的一百多個「數字卦」也都成了陰陽爻的易卦，所謂的數字卦就不存在了。

李先生把包山楚簡和天星觀楚簡的數字卦都說成是陰陽爻的易卦，固然與事實不符，但他說「一種是一橫筆，一種是兩斜筆，並非數字而是卦畫」，證之於戰國秦漢各種寫本的易卦，則十分正確。金景芳先生指出阜陽漢簡與馬王堆帛書的易卦「都是《易》的卦畫，而不是用數目字記爻」，<sup>41</sup>也是非常正確的。

阜陽雙古堆的易卦和馬王堆帛書易卦，多數學者認為是由數字卦一脈相承到「一、八」的結果，我們認為實際則是陰陽爻。而被認為從四個數字過渡到兩個數字的王家臺秦簡易占，李學勤先生根據簡報的內容說「符號也是由一橫筆、兩斜筆兩種組成」、「陰爻上連或分開的兩斜筆，當時人為了方便，把『--』寫成兩斜筆」，<sup>42</sup>則兩斜筆不論上連或分開，都只是表示與陽爻分別的陰爻，不是數字的六或八。<sup>43</sup>於今看來，其陰爻符號只有^一種而已，更無其他；也不存

<sup>40</sup>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臺北：五四書店，1994），頁213-215。

<sup>41</sup> 金景芳，《學易四種》（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196。

<sup>42</sup> 李學勤，《重寫學術史》，頁395。

<sup>43</sup> 廖名春在比較秦簡《歸藏》、上博《周易》和馬王堆帛書《周易》後，說：「^或八如同馬王堆帛書《易經》的，~一樣，只是陰爻的一種別寫，而不是性質不同的數字。」

在「混用」的現象。<sup>44</sup> 上博楚簡《周易》卦畫，也是陰陽爻。

另一方面，李零先生的看法與李學勤先生恰恰相反，他認為所有卦畫都是數字組成的；一般所說的數字卦為「十位數字卦」，而從戰國以來直到宋以後的易卦，是由數字一、八組成的「二位數字卦」，<sup>45</sup> 如此則所有易卦都不是陰陽爻。本文對此亦未為苟同，尤其從《周易》的筮數觀察，益見其不然。下文相關問題中會附帶討論。

## 五、易與筮數及陰陽學說

### （一）易與筮數

本文雖提出將數字卦直接按「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轉換為易卦，其做法有可商榷，同時不認為今本易卦的卦畫由數字變來，但並非即謂易占與筮數無關。

《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十有八變而成卦。」<sup>46</sup> 朱子《易本義》卷首有〈筮儀〉一篇，對此有所解釋；<sup>47</sup> 何澤恆先生更詳細疏證這個複雜的問題。<sup>48</sup> 根據「大衍之數」的方法，所得的數字是六、七、八、九，而且不可能有其他數字。但今所見商周數字卦，除此四數之外，尚有一、五、十，即此可見數字卦與《周易》（含《歸藏》）為不同系統。或以為「初無約定的策數，故所得餘數不一」，亦即早期為十個數，到〈繫辭〉的時代才演變為四

---

見廖名春，《新出楚簡試論》（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十七章，〈王家臺秦簡《歸藏》管窺〉，頁320。這種說法是很正確的。

<sup>44</sup> 李零認為王家臺秦簡易占以六、八表示陰爻「二者似是混用」，見氏著，《中國方術續考》，頁313。

<sup>45</sup> 見李零，《中國方術續考》，頁319-320。

<sup>46</sup> 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兼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頁152。

<sup>47</sup> 朱熹，《易本義》（臺北：世界書局，1982），頁2。

<sup>48</sup> 何澤恆，〈略論周易古占〉，收入氏著，《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頁1-6, 23-25。



個數。然而，按「大衍之數」的做法，不論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六、七、八、九這四個數字，這恐怕不是「時代演進」所能解釋的。李零先生說：「按通常理解的『大衍之數』，我們也不可能得到『十位數字卦』。」因此主張「最好還是按直觀特徵把它們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十位數字卦』，一類是『兩位數字卦』（三易）。」<sup>49</sup> 把「三易」和「十位數字卦」分開是有意義的，可惜只是「按直觀特徵」，未做深入論證；把「三易」的卦畫也說成「數字卦」則尚有可商。<sup>50</sup>

「大衍之數」的方法，既然只能得到六、七、八、九，不論是「九、六變而七、八無爲」<sup>51</sup>（即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亦即九變八，六變七），或是「七、八爲爻之本體，九、六爲爻之別名」，<sup>52</sup> 關鍵數字都是「七、八」，如何能變成「一、八」？<sup>53</sup>

韓自強先生對此曾有解釋，他說：

天星觀楚簡卦畫使用的數是一、六、八、九，沒有七，這與〈繫辭〉揲著方法所得餘數不符，似乎令人費解。其實古人寫七，中間一豎不彎曲，是直的，為使與十字有分別，豎筆寫得非常短，……七也可以變爲一。因此，我們把卦畫的一視為七，天星觀楚簡卦畫使用的數字，正與「大衍之數」的揲著法得出的六、七、八、九數字相符。<sup>54</sup>

此說意在爲天星觀楚簡數字卦與〈繫辭〉的數字牽合。但在可以看到的《易經》寫本的卦畫裏（包括戰國楚簡、王家臺秦簡、馬王堆帛書、阜陽漢簡，加起來超過一百個），所有陽爻的符號都是「一」（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數字一），絕不見任何一個作七或疑似七的踪影，很難說這一百多個「一」，無巧不成書地全都是「七」的譌變，真可以把卦畫的「一」都視爲「七」！

天星觀楚簡的數字是「一、六、八、九」，已難視爲「與『大衍之數』的揲著法得出的六、七、八、九數字相符」，而同時代的包山楚簡和葛陵楚簡，其數

<sup>49</sup>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頁319。

<sup>50</sup> 從李先生書中所附的「筮法的發展」（頁320）看，從戰國至今本的易卦，都是由一、八兩個數字組成的「兩位數字卦」。

<sup>51</sup> 此為朱子櫟括歐陽修語，見《易學啟蒙》卷四。歐陽公原文分作「九變而七無爲」、「六變而八無爲」，見《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一八，〈明用〉，頁4-5。

<sup>52</sup> 見《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頁8，孔穎達《正義》引張氏之說。

<sup>53</sup> 多數學者認為各種簡帛寫本《易經》的卦爻是數字一、八組成的。甚至說是「使用」這兩個數字。

<sup>54</sup>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68；又見《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91。

字是「一、五、六、八」，要變的不只是一，還有五，且沒有九，如何與「大衍之數」的「六、七、八、九」相符？

從這樣看來，卦畫的所謂一、八，跟「大衍之數」所得的七、八，恐怕是難以比附的。

## （二）卦畫的陰陽爻

關於數字卦與陰陽爻的關係，前面介紹了幾種主要的說法：1. 張政烺先生等學者主張，陰陽爻的易卦是由數字卦變來的。這是學術界絕大多數學者普遍接受的意見。2. 李學勤先生認為一般所認識的數字卦，也是陰陽爻。3. 李零先生認為從戰國以迄今本易卦的陰陽爻是數字一、八。拙文以為：1. 陰陽爻不是由數字卦演變來的；2. 組成數字卦的不是陰陽爻；3. 陰陽爻的易卦也不是數字組成的。前文對此說之已詳，這裡再補充談一下簡帛寫本易卦的問題，因為各種說法的關鍵點都在此。

簡帛寫本易卦，張政烺、李零都認為是數字一、八，所不同的是，張政烺認為由此數字往下演變為陰陽爻，李零則認為由此以迄今本的易卦，都是數字一、八。李學勤先生把數字卦的數字都說是陰陽爻，雖疑不如所言，但他認為簡帛寫本易卦是陰陽爻，則很有見地；雖然有人認為只是假說，然而認為所有易卦均為數字，不也是一種假說？「易含萬象，所託多塗」，<sup>55</sup> 代遠難稽，難免假說，要在其理有固當而已。

前面說過「大衍之數」產生的數字只能是六、七、八、九，除非「大衍之數」與《周易》無關，否則再如何截截諛言，都不可能變成一、八。李零先生說：「按通常理解的『大衍之數』，我們也不可能得到『十位數字卦』。」<sup>56</sup> 但同樣的理解，也不可能得到一、八的「二位數字卦」。

既然「大衍之數」不可能產生一、八的數字，那麼「三易」的易卦就不會是數字一、八。朱子〈筮儀〉：「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扚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並自註說：

掛扚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耦。掛扚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所謂重也；掛扚兩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

<sup>55</sup> 見《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頁8，孔穎達語。

<sup>56</sup> 李零，《中國方術續考》，頁319。

策而為少陰，其畫為--，所謂拆也；掛扚兩耦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而為少陽，其畫為—，所謂單也；掛扚三耦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X，所謂交也。

我們不知道朱子此說的根據，但為朱子研《易》所得，則毫無可疑。《儀禮·士冠禮》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所畫的也不是數字。<sup>57</sup> 朱子所說的□、X非數字無可辯，則—、--非數字不待辯。也許「九、六變而七、八無為」，老陽變少陰，老陰變少陽；或者「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sup>58</sup> 所以爻畫就只有—、--二種。至於為何用此二畫，就跟用□、X一樣，是一種約定俗成。

用朱子「畫其爻於版」的話，加上—、--表少陽、少陰，似乎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把數字卦變為易卦有其合理性。但數字卦的數字，與三易的數字，是不同的系統，數字卦的內容與《周易》的文字也頗不相應（說詳下），都是「數字卦演變為易卦」之說的障礙。何況，依渠等說法，陰陽爻的符號，是由簡帛寫本的一、八「字形」變來，與「大衍之數」所得的「數字」若不相涉。

### （三）陰陽學說與陰陽爻

我們對易卦的認識，以—表陽爻，以--表陰爻，因此無可避免地受到陰陽家學說的影響，認為在陰陽學說興起之前，不可能有陰陽符號組成的卦畫，這當然是言之成理的。但即此而論，至少已證明在陰陽學說大盛的戰國時期出現陰陽爻，是絕對可能的，遑論秦漢！許多學者認為與今本無甚差異的《周易》應完成於戰國時期，卻又認為陰陽爻易卦必須漢初以後，甚至東漢末年才可能出現，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我們認為，易卦的爻畫不但在戰國就應該出現，甚至更早，絕不應晚至漢代，而其爻畫是不是只能代表陰陽，也還可以討論。屈萬里先生曾就卦爻辭所說

<sup>57</sup> 《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頁4。

<sup>58</sup> 以上二句皆朱子櫟括歐陽修語。參註51。第二句歐陽公原文分作「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

到的器物和習用語推證，「判斷卦爻辭當作成在周武王的時代」，<sup>59</sup> 並「從而可以推斷畫卦和重卦的時代，也應當在西周初年」，<sup>60</sup> 意即易卦與卦爻辭的時代不可能相去太遠，這個推測是合理的。如只有卦畫而無辭，將何據而判斷吉凶？如無卦畫，又從何爲之辭？這也是我們未便認同「卦爻辭與今本無異，卦畫爲今本前身」的一個原因。孔穎達《周易正義》引先儒云：「後代聖人以易占事之時，先用蓍以求數，得數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辭」，<sup>61</sup> 深刻描述了數與卦、爻、辭的產生背景。若說卦爻辭於戰國時已與今本無異，而卦爻竟要遲至東漢末年才能完成，寧非怪事？

如果我們認同卦畫的時代爲西周初年，必得要解釋「陰陽」的問題。一般的認知裏，卦畫是由陰陽爻組成的，在戰國陰陽之說興起前，似不應有陰陽爻，西周初年亦自不應有陰陽爻組成的易卦。然而今本《周易》非一時之作，其間出現的陰陽思想是後代陸續增加的。大家知道，《周易》的古本原是經、傳分開的，漢魏解經家才把傳雜入經文。如果把經、傳分開來看，所謂陰陽學說幾乎都出現在傳，而不在經文。在經文時代無陰陽學說，其卦畫自亦可不代表陰陽。換個角度說，戰國之前未必就沒有陰陽思想，只是未被刻意強調，其思想的內涵，也不必與易傳相同，如晝夜這樣的簡單觀念，未嘗不能是陰陽思想的內涵。

李大用說：「至於——、--兩個基本符號和八卦的原始意義是什麼的問題，古往今來，更是異說紛呈：什麼——、--代表天地、陰陽、蓍草長短、男陽女陰、奇數偶數；什麼——、--符號是受象形文字、結繩記事、龜卜兆紋的啓發而形成等等，既莫衷一是，又都是無從確證的揣測。」<sup>62</sup> 我們認爲各家立說，都著眼於提出「一種」看法，才會異說紛呈，莫衷一是。其實，這個問題要求其「一是」，既無可能，且無必要。方其運用之初，或許本就代表多種相對的意義，可以各取所需；到陰陽學說大盛之後，「陰陽」取得絕對優勢，卦爻也以陰

<sup>59</sup> 屈萬里，〈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王時考〉，收入氏著，《書傭論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7-28。

<sup>60</sup> 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頁312。屈先生在〈易卦源於龜卜考〉中也提到：「不但八卦和六十四卦是同時的產物，即卦辭和爻辭，也必然是和卦畫同時產生的。」見《書傭論學集》，頁51。

<sup>61</sup> 見《十三經注疏·周易兼義》，頁8。

<sup>62</sup> 李大用，《周易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1-2。李先生主張易卦是由甲骨灼後裂紋而來，《周易》經文都是西周初年的歷史記錄。

陽爻指稱之，此說定於一尊，後人受此影響，言《易》遂不離於陰陽。甚且，今所習見之陰陽爻作「—」、「--」者，未必不是最後約定俗成的結果，其初儘可用不同符號為之代表。<sup>63</sup>

## 六、易卦爻畫的設想

著錄於《博古圖》的「商卦象卣」，器蓋都有「𪚩」的鑄銘。（圖一三）其說明文字云：「蓋與器銘共二字，作卦象。觀古人畫卦，奇以象乎陽，耦以配乎陰，一奇一偶而陰陽之道全，一虛一實而消息之理備。……是卦也，上下爻皆陽，有乾之象；中二爻皆陰，有坤之象。虛其中亦取象於器。」<sup>64</sup> 過去學者都不以為然，現在看來是值得重視的意見。張亞初、劉雨另舉商末周初的二器，都有「𪚩」銘，周初器有「𪚩」，以及東周的陶印有「𪚩」，認為這些符號「是占筮的卦畫符號，與八卦可能是同源而不同流，這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卦象」。<sup>65</sup> 這個意見很有參考價值。山東出土的古陶文有「𪚩」，<sup>66</sup>（圖一四）有可能也是一種易卦符號。也許《周易》卦畫與這些「卦象」的關係，比與數字卦的關係更為密切。《周易》以「--」、「—」代表陰陽兩個相對的概念，「卦象」的實線「—」與虛線「--」，可以代表任何相對的兩個概念，如《老子》所說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等，<sup>67</sup> 或如《博古圖》所說的「虛實」，不必拘限此時陰陽學說之已否形成。說《周易》易卦的陰

<sup>63</sup> 但不是數字一、八。

<sup>64</sup> 《博古圖》卷九，頁17。《博古圖》圖版不清，其說明文字只提到「上下爻皆陽，中二爻皆陰」，意即器、蓋同銘。承李家浩師見示：《嘯堂集古錄》摹寫，器與《博古圖》同，蓋作「𪚩」。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三，頁51：「今觀商〈卦象卣〉所刻，器作『𪚩』，蓋作『𪚩』」（點校本作「商卦、象卣」，疑誤），又有不同。按：《博古圖》以此「卦象」比於揚雄《太玄》云：「今爭首：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與此卣卦象正同。」然司馬光〈說玄〉云：「《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見《太玄經集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44冊，頁281），則卦象之三段虛線為與實線相對者，太玄三段虛線為三，是「道同而法異」。

<sup>65</sup> 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2。

<sup>66</sup>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92，編號3.1066。

<sup>67</sup> 《老子》（王弼，《老子注》〔古逸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第二章。

陽爻，跟這些符號「同源而不同流」，是有可能的。當然，受限於材料太少，這也只是一種推想而已。

李學勤先生認為這些卦象根本是「冊」字，並舉《歐米菟儲支那古銅精華》47的「冊」為例，<sup>68</sup>（圖一五）認為《博古圖》的卦象卣「實際上是誤轉了九十度，應將橫線改正為縱線」。從這個例子看，李先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否其他類似符號都是這種情況呢？

李先生另舉「中央再加一條連通的直線」的甗銘「冊」，認為也是「冊」字，而解讀這些銘文的「鑰匙」，則是兩件晚商的戈，其銘作「冊」、「冊」，<sup>69</sup>（圖一六）李先生認為「在右側直線外面，與中間三線的兩處斷口相對，有一半環形曲筆。《殷周金文集成》正確地釋此銘為『冊』字。原來，銘文縱線上的斷口實象簡冊的編組，如由半環形筆向左延伸，正好成一『冊』字」。「按照當時銘文體例，『冊』應為作器者的族氏，與卦畫沒有任何關係」。<sup>70</sup>

「冊」、「冊」與卦畫無關，自然毫無疑問；但它與「冊」是否無別，則不必然，「半圓形曲筆」之有無不應全無差異。說此等字均為「冊」字，恐未必如此。甲骨文、金文冊字或從冊之字尋見，類作「冊」，形義俱顯，無從「斷口」者。<sup>71</sup>「簡冊的編組」本不難取象，捨此不由而獨取「斷口」之象，亦頗違常理。

如果「冊」、「冊」不同於「冊」，自然就更不可能是「冊」字。它會不會也是易卦的一種形式？<sup>72</sup> 這種可能性恐不能完全排除。卦象卣與山東古陶文這類符號不必然是誤轉九十度的結果，更與「冊」字無關。這類符號，不但不是易卦的起源，反而可能是受到易卦的影響才如此畫記的。於此亦可見在古代占筮的方法是多元的。

當然，如果「—」、「--」是後來約定俗成的結果，其初且允許不同的記法，則為此符號去比附、探源，不啻緣木求魚，且亦無此必要。

<sup>68</sup> 此銘另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十五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9760號。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收於附錄607號。

<sup>69</sup>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十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10765, 10766號。

<sup>70</sup> 李學勤，〈出土筮數與三易研究〉。

<sup>71</sup> 參看孫海波，《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31, 259-262號；容庚，《金文編》，31, 308-311號；附錄上453-465號。

<sup>72</sup> 但不是三易。



## 七、本卦、之卦的問題

一組數字卦，對應出一個《周易》卦名；兩組數字卦同時出現時，學者往往把它們解釋為《左傳》的「遇某之某」。《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

按照《左傳》的易例，本卦與之卦相異的爻只有一個，取義於此相異之爻的「本卦」爻辭。《左傳》引《易》者以涉及本卦、之卦的占筮居多，皆只有一爻變。〈襄公九年〉的「艮之隨」說：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相異者五爻，相同者一爻，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杜注：

《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是「遇八」非《周易》。孔穎達《正義》更疏之曰：

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爻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sup>73</sup>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sup>74</sup>

然則《周易》的本卦、之卦只有一爻變；「古易」則只有一不變。不論從變或不變，都只是一爻。<sup>75</sup>

《侯馬盟書》303:1的三行墨書：

<sup>73</sup> 見《國語》（嘉慶庚申讀未見書齋重雕天聖、明道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晉語四〉，頁263，韋昭註：「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

<sup>74</sup> 《春秋左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頁526。

<sup>75</sup> 「遇八」的問題，歷來不同意見很多。何澤恆先生有很深入的評介，參見所撰〈略論周易古占〉，收入氏著，《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頁25-31。

癸二全五

卜以吉

筮□□<sup>76</sup>（圖一七）

朱德熙先生引李家浩先生的說法，認為是睽卦的第二爻和屯卦的第五爻。<sup>77</sup> 這是特別指出某卦其中一爻的另一種方法。

但如學者所說的，從數字卦所遙譯過來的「遇某之某」，情況與《左傳》的易例有很大的不同。如湖北江陵天星觀出土的竹簡，<sup>78</sup> 其五組數字卦中，寫成《周易》易卦和「遇某之某」之後，只有一組是一個爻變，另有三組各有三個爻變，到底應取不變者或取爻變者？<sup>79</sup> 更奇特的一組數字卦，二者都是「一六六六六六」，寫成易卦都是䷋，說成「遇剝之剝」，竟是六爻全同。張政烺先生說：「既然不動，為什麼也要寫出來？大概當時每筮都要布策兩遍，作記錄，較其同異，以明卦象。」<sup>80</sup> 或以為取義於卦辭，不取義於爻辭；但這與《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在乾其坤」的做法也不一樣。

包山楚簡數字卦凡六見，皆二組數字並列，其中一爻相異者一見，二爻相異者一見，而三爻相異者竟至四見，是要取義於相同者或相異者？

新蔡葛陵楚墓的數字卦凡十三見，亦皆兩組數字並列，除甲三132+130、乙四102殘斷不全外，其餘兩組並列的數字卦中，一爻相異者一見，三爻相異者四見，四爻相異者四見，五爻相異者二見。殘斷的甲三132+130，從可見的數字看

<sup>76</sup>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頁157。摹本見同書頁289, 46。

<sup>77</sup>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78。原文引出處誤為300:1，今正。

<sup>78</sup>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此文提到：「特別是有的簡文在句末或句中還記錄了占筮的卦象，在楚簡中這還是第一次見到。」但並未說明「占筮卦象」的具體內容。張政烺先生《易辨》中記錄了五組天星觀楚簡的筮卦，是根據「參觀後所作的筆記」。它們是：「一一一一一六，六六一六一六」（姤之解）、「一一一六七六，八一一一六六」（訟之咸）、「一六一六一六，九一一一一」（噬嗑之乾）、「一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剝之坤）、「一六六六六六，一六六六六六」（剝之剝）。

<sup>79</sup>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書後附了四段天星觀楚簡的照片，其中第四段最後有一數字卦，為兩組數字並列，與其他楚簡數字卦形式完全一致。右側為「六六六一一一」，左側筆劃略有殘損，觀察應為「六一一六六六」，依張先生的做法，可說為「泰之萃」，有五爻變。

<sup>80</sup> 張政烺，《易辨》。

來，其相異的爻至少也有兩個。其一爻相異者固不難以「占變爻」為說，其五爻相異者，亦可說為「以不變為占」，然而其三爻相異與四爻相異者各有四見，這種不論從「變」與「不變」都無法解釋的數字卦，在完整的十一處數字卦中，竟高達八處之多，<sup>81</sup> 這種現象對慣於以百分比立說者而言，將是何其突兀！

再來看看周原甲骨的情形。陝西扶風齊家村所採集的卜骨FQ6，其上三處刻有數字卦，<sup>82</sup> 正面的一組：「□一六六六八」，情形比較單純；背面右側的二組：「六八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或說為「䷋謙之同人䷌」，然而相異者四爻。尤其背面左側有直列的四組數字卦，由上往下的順序是「六八一——八」、「八八六六六六」、「一八六八五五」、「六八一——一」。(圖一八)按學者的說法，寫成易卦分別是「䷋」(恆)、「䷋」(坤)、「䷋」(損)、「䷋」(大壯)，雖然有人把它說成「恆之坤」、「損之大壯」，<sup>83</sup> 姑且不論其如此「分組」是否正確，這樣的分組，其相異的爻都是三個，也與《左傳》的易例明顯不合。我們並不排除數字卦有本卦、之卦的可能性，但其性質與《左傳》的易例不同。

朱熹《易學啟蒙》說：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sup>84</sup>

對解釋各種爻變，或不無助益。但朱子也多次自稱「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仍不免推論成分。何澤恆先生詳細論證朱子所擬的七項《易》占凡例，證之經籍，認為「確然信而有徵者三項，另四項或經傳無文可證，或雖有舉證，而其解釋尚有爭議未能遽加論定。《啟蒙》占例之說，推想的成分超過了一半，但其推想仍不失為周匝完密，可算是一種合理之推斷。」<sup>85</sup>

<sup>81</sup> 每一處各有兩組並列的數字卦。

<sup>82</sup> 曹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頁154-155。

<sup>83</sup> 參季旭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文後的附表。原文誤「大壯」為「泰」。

<sup>84</sup> 《易學啟蒙》卷四。

<sup>85</sup> 引文稍有節略。見〈略論周易古占〉，頁31。

## 八、楚簡數字卦內容與《周易》的對應

朱子占例雖頗有「經傳無文」的推測，但學者認為是一種合理的推斷。前述的中方鼎數字卦，李學勤先生也是援用朱子占例的方法，引用《周易》的相關文字，認為該數字卦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卦，所以「中」才把它鑄在鼎上，並解釋說「方鼎銘沒有明言《周易》，無法絕對判定用的是《周易》，不過用《周易》解釋竟如此合符，恐怕不是偶然的」。<sup>86</sup>

按照學術界普遍的說法，楚簡的時代相當於《周易》「與今本無異」的時代。我們用同樣的方法，來看看楚簡中的數字卦，對應《周易》的內容。

### （一）包山楚簡的數字卦

數字卦與比較多文字同時出現的，主要是楚簡，尤其是包山和葛陵楚簡。

包山楚簡的卜筮祭禱簡中出現了六處兩組並列的數字卦。其卜祭簡完整的格式有前辭、命辭、占辭、禱辭和第二次占辭等五大部分。<sup>87</sup>「前辭」記錄時間、人物；「命辭」記錄占卜的事由；「占辭」一般先指出長期之休咎，然後再指出近期的吉凶；「禱辭」是為了解除近期內的憂患向鬼神祈禱，當然祭禱所供奉的祭品也是記錄的重要內容。經過祭禱之後，第二次的占辭一般是「吉」。<sup>88</sup>

不論有無數字卦，我們所看到的占辭，所謂長期的休咎，一般都是只有休沒有咎，這或是對未來寄以希望和信心而有的說辭。所以占辭的前段，幾乎都是「恆貞吉」。但「恆貞」之後的所謂「近期的吉凶」，則多數是偏向「不吉」的，也正因為不吉，才有往下「禱辭」的必要。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想要判斷卜筮結果的吉凶，重點應放在「近期的吉凶」，那才是面對現實的實話，不像「恆貞」一樣，只是美好的願景。

從這個理解出發，來看看包山楚簡的數字卦，如果依學者以往的解釋，利用《周易》的文辭，能不能印證卜筮祭禱簡的內容？

包山楚簡201、202的命辭是：「出入事王盡卒歲，躬身尙毋有咎」，占辭

<sup>86</sup> 李學勤，〈中方鼎與周易〉，頁160。

<sup>87</sup> 當然不是每一則都具備這五項。卜祭簡詳略有所不同，內容則有相當程度的重複。

<sup>88</sup> 卜筮祭禱簡的格式、內容，參見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收入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頁555-563。

是：「少（小）有憂於躬身，獻爵位遲踐」，數字卦是：「六六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依大部分學者的認識，是䷏豫之兌䷹。占辭當是依此數字卦所作的判斷，大意是有憂，而且升遷很慢。依朱子占例，「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按朱子所說彖辭即卦辭，豫卦卦辭：「豫，利建侯行師。」彖傳：「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兌卦卦辭：「兌，亨，利貞。」彖傳：「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顯見一片「政通人和、順天應人」的景象，筮者如何能依據這樣的文字，作出「爵位遲踐」的判斷呢？雖然筮者比附、解釋甚至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很大，但如果其所根據的真是《周易》文字，恐怕再如何天馬行空，也不能做出如此南轅北轍的占辭。

又如包山210，命辭「盡集歲，躬身尙毋有咎」，占辭是「少有憂於躬身與宮室，獻外又不訓（順）」，數字卦是「一六六八一一、六六六八一一」，譯成易卦為「䷧損之臨䷒」，依朱子占例「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損卦上九爻辭：「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王弼註：「尙夫剛德，爲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則天下爲一，故无家也。」與「外又不順」恐怕也是頗不相應的。

當然包山楚簡還有幾個數字卦，有些占辭與《周易》文字的對應，相符與否一時仍難做出判斷。但上述兩個例子，則明顯與《周易》的文字不相符。

這種情況頗值得注意，它似乎說明了當時的貞人所據以判斷吉凶的數字卦，用的根本不是《周易》的文字。否則就不會出現《周易》文字與楚簡占辭牛頭不對馬嘴的現象。

## （二）葛陵楚簡的數字卦

新蔡葛陵楚簡內容大多是墓主平夜君成生前的卜筮祭禱記錄，占卜的內容以求問病情爲主，簡文格式與包山楚簡非常相似。竹簡出土時已被盜墓者擾亂成幾塊，全部殘斷。<sup>89</sup>

<sup>89</sup> 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頁183, 173。

葛陵楚簡的格式雖與包山楚簡非常相似，但敘述方式仍有些許不同。如包山楚簡的命辭大都在某為某貞之後，直接敘述貞問的事由，如「陳乙以共命為左尹貞：既腹心疾，以忘慙，不甘飢，尚速瘥，毋有柰」（包山239），只有二條「貞」後是「以其下心而疾，少瘳」（包山218, 220）。葛陵楚簡則更加明確指出貞問的緣故，如「或為君貞：以其遲出之故」、「或為君貞：以其無恆崇<sup>90</sup>之故」（均見甲三：112）、「或為君貞：以其不安於是處也」（甲三：132 + 130）、「或為君貞：以其不良悲瘳之故」（甲三：184-2, 185, 222）。

在命辭的「事由」之後，往往接「尚……」，如包山簡和葛陵簡都常見的「尚毋有咎」（包山197、葛陵乙四：85等）。包山簡的「尚速瘥，毋有崇」，<sup>91</sup>與葛陵簡的「尚速瘥，毋有咎」（甲三：194）辭意相似，都是表示期望疾病很快的痊癒。從這許多例子看起來，楚簡的命辭都不是問句。

在占辭方面，跟包山簡一樣，「恆貞」總是好的，接著才是根據卜筮判斷吉凶的真相。如「恆貞無咎。疾遲瘥，有瘳」（甲一：24）意思是長遠來看是好的，但近期內則疾病好得慢，可能還有其他的病。上面引到的殘辭說：「□君貞：既有疾，尚速瘥，毋有咎。占之：難瘥。」（甲三：194）根據辭例，「君貞」前面應可補「或為」二字，全辭的意思是因為有病所以才占卜，並希望病快痊癒且無災咎。但占卜的結果是：病難痊癒。包山楚簡236「疾難瘥」意相彷彿，但編著者把「難」解釋為「惡」，以「瘥」為「疾病」，<sup>92</sup>辭意很難說得通。根據葛陵簡的理解，包山的「疾難瘥」就是「病難痊癒」。葛陵簡還常見到「速瘳速瘥」（如甲三：22等），都是「疾病速癒」的意思，如把「瘥」說成疾病，就講不通了，絕對沒有希望趕快生病的道理。

葛陵簡一般都比較殘斷，所以完整的篇章相對較少，出現數字卦的地方，更是斷簡殘編，難窺究竟，也很難從中檢驗吉凶的判斷與數字卦對應的《周易》文字是否相符。比較可以討論的是乙二：2的「毋有咎，◎<sup>93</sup>貞之曰吉。宜少（小）遲瘥。以其□」，依辭例最重要的占辭是「宜少遲瘥」，也就是病好得

<sup>90</sup> 原釋文作「米」，邵尚白以為即包山楚簡的「柰」，讀為崇，可信。見所撰〈葛陵楚簡中的卜筮記錄〉（待刊稿），註21。此文承顏世鉉先生提供。

<sup>91</sup> 見236, 239, 242, 243, 245, 247諸簡，原釋文作「尚速瘥，毋有柰」，釋遽為並，為同；瘥為疾病。「尚同病」與「毋有崇」不類，且與「尚」表期望之意不合。

<sup>92</sup> 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58，註462, 464。

<sup>93</sup> 本文用此符號表示出現數字卦的位置。



慢，這總不是好事，所以「以其」底下的殘文應是「故斂之」，然後是祭禱的內容。這個數字卦是「六八六一六六，一六六六一」，依多數學者的解釋應為「䷋謙之頤䷚」，依朱子說法：「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謙卦卦辭：「謙，亨。君子有終。」頤卦卦辭：「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並沒有明顯屬於凶的內容。

甲三：184-2：「未良瘥。◎或為君貞：以其不良患瘥之故，尙毋有崇，倉占之」。本辭數字卦「五六五六六六，六六六六一六」，依學者之意，為「䷋晉之師䷆」，因為「倉占之」以下斷缺，無從驗證。另甲三：112：「𠄎遲出。◎或為君貞，以其遲出之故，尙毋有崇，嘉占之曰：無恆崇。◎或為君貞：以其無恆崇之故𠄎。」此則卜祭簡應有三段，第一段殘斷，第二段的數字卦「一六一一六六，六一一一六」，依學者所說為「䷆旅之大過䷛」，相異者三爻，依朱子意取本卦、之卦彖辭。按：旅卦卦辭：「旅，小亨，旅貞吉。」大過卦辭：「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從這些文字看來，似乎不易得出「無恆崇」的判斷。從葛陵簡的記錄，「無恆崇」當指長遠來看並無災難，言下之意近期則可能有些小麻煩，所以才有底下「或為君貞，以其無恆崇之故」的占卜。<sup>94</sup> 楚簡的卜筮，往往長遠是好的，而近期則凶多吉少；正因為眼前的一些不如意事，所以進行占卜。我們無法判斷「無恆崇」所隱含近期的「崇」到什麼程度，但「無恆崇」的結果總不是很糟。從旅卦和大過的相關解釋文字看來，其情況似比簡文所記的更差。<sup>95</sup> 不過，總的來講，這一則簡文跟《周易》文字的相應程度，還不是十分明確。

從包山楚簡跟葛陵楚簡的數字卦與《周易》文字對照的情形看來，雖然有些尚無法明確判斷其相應的程度，但確有不少頗為鑿柄的情況。我們再回頭看看前面提到的李學勤先生對南宮中鼎數字卦的解釋。李先生引《周易》相關爻辭及各家解釋，證明這是一個「大吉大利」的卦，所以「中把這一占筮鑄于彝器」，等於也為數字卦和《周易》的聯繫創造了合理性。但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去檢驗包山、葛陵等楚簡的若干卜祭記錄，卻得到完全不一樣的結果，這使我們不禁懷疑，南宮中鼎所謂「剝之比」的「大吉大利」，未始不是一個巧合！此鼎的數字卦必然是吉利的，否則沒有「鑄于彝器」的理由，但它所據以言吉的材料，就不一定是《周易》了。

<sup>94</sup> 承李家浩師電話中提示：再一次的占筮，是為了再確認「無恆崇」的占斷結果。

<sup>95</sup> 從彖傳、王弼注、孔穎達《正義》的解釋看，凶的成份多於吉。

## 九、結論

商周秦漢遺物上所見的數字卦，其意義自來有奇字、族徽等說法；自張政烺先生把它與《周易》聯繫起來之後，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主流意見；多數學者認為《周易》的卦畫是由數字卦演變而來。筮卦的數字最先由一到十組成，進而向一、六、八集中，再到如帛書《周易》的「—」、「𠄎」（八）。最後「—」變為陽爻「⚊」，把「𠄎」（八）拉平，變成陰爻「⚋」，至此由陰陽爻組成的易卦正式成立，亦即易卦是由數字卦變來，一脈相承的直向發展。

經本文論證的結果，我們認為：數字卦與易卦可能是兩個不同的系統，這兩個系統還曾經同時存在，兩者並無「一脈相承」的演變關係；易卦並非由數字卦演變而來，它很可能一開始即由抽象的幾何線條組成，最後約定俗成，成為固定的形式，陰陽學說大盛之後，遂為「陰陽」名稱所專。

或有學者把數字卦都看作陰陽爻，另有學者則主張，從戰國以來至今的易卦，都是由數字一、八組成的。我們認為：一般所說的數字卦，自是由數字組成無疑；而陰陽爻也不會是數字。戰國秦漢各種《易經》寫本，其卦爻是陰陽爻，不是過渡到陰陽爻的數字，也不是陰陽爻的前身。從學術思想發展的角度看，陰陽爻組成的易卦，沒有理由晚至東漢末年才完成。

學者因為「奇陽偶陰」的認識，以及《周易》易卦由數字演變而來的想法，無形中數字卦與《周易》的關係顯得十分密切，但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兩個不同的系統，而利用《周易》的內容去解釋數字卦，也往往是講不通的。

學者把並列的二組數字卦，利用《左傳》的易例作解釋，實際則恐未必然。兩組甚至兩組以上的數字卦同一處出現，似難看成《左傳》所說本卦與之卦的關係，至少其意義應與《左傳》所述者有異；它們也許只是占筮多次的記錄。

（初稿2004年生日改定，修訂稿2005年生日改定，定稿時2006年生日將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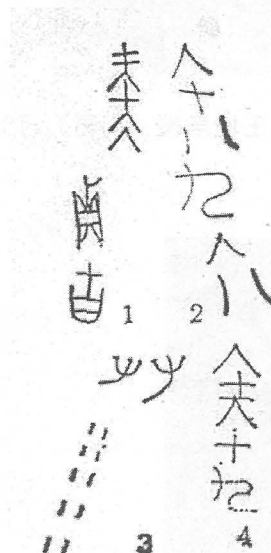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附圖

(附圖以便於參考為主，主要針對數字卦的部分，多數未取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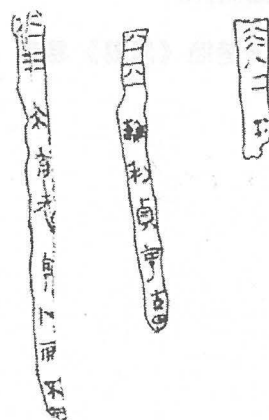
圖一：南宮中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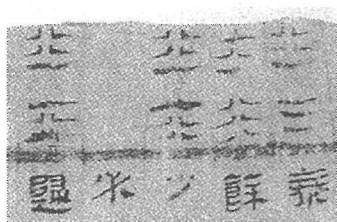
圖二：商末卜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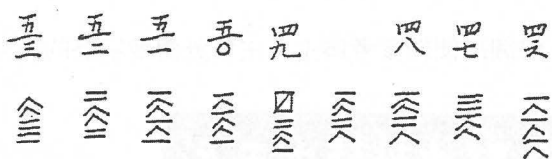
圖三：商末陶爵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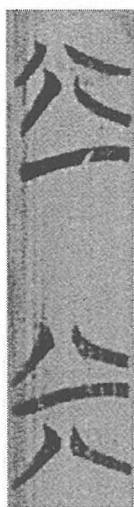
圖四：阜陽漢簡《周易》卦畫



圖五：馬王堆帛書《周易》易卦



圖六：王家臺秦簡易卦



圖七：上博楚簡《周易》易卦



圖八：包山楚簡 229



圖九：包山楚簡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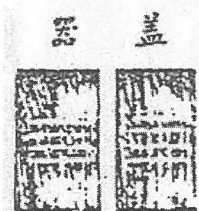
圖一〇：包山楚簡 210



圖一一：葛陵楚簡·乙四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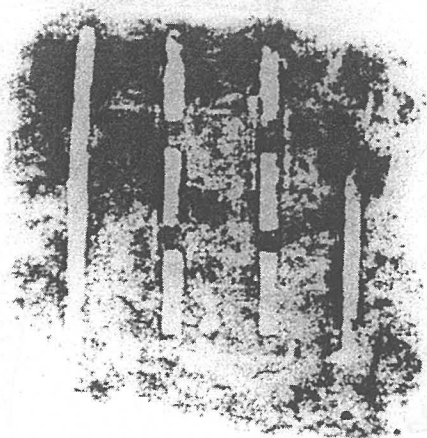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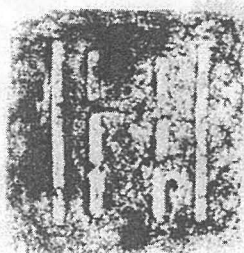
圖一二：葛陵楚簡·乙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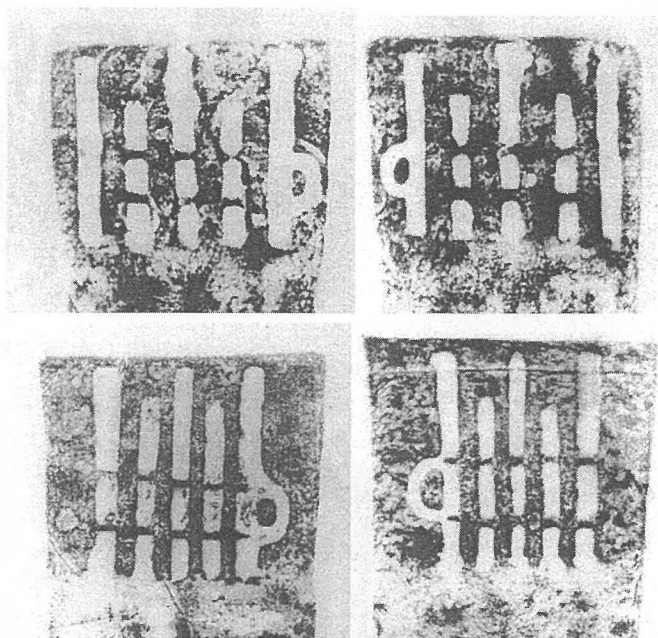
圖一三：卦象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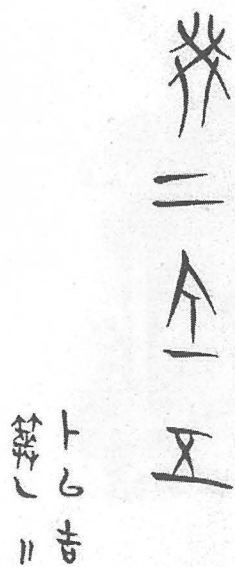
圖一四：山東古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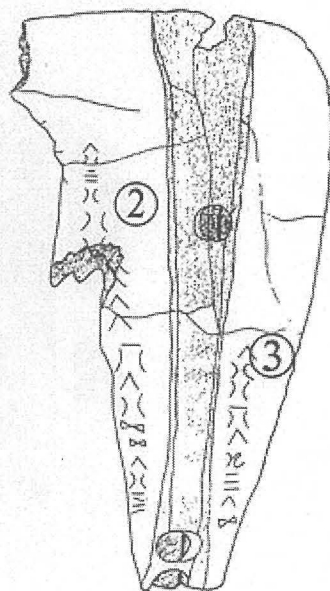
圖一五：《集成》9760



圖一六：《集成》10765（上二），10766（下二）



圖一七：侯馬盟書



圖一八：扶風齊家村採集卜骨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國語》，韋昭註，嘉慶庚申讀未見書齋重雕天聖、明道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 《儀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王侁，《嘯堂集古錄》，據上海涵芬樓借景蕭山朱氏藏宋刊本重印，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
- 王弼，《老子注》，古逸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 王弼，《周易兼義》，韓康伯注，收入《十三經注疏》。
- 王黼，《宣和博古圖》，明萬曆十六年泊如齋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簡稱《博古圖》。
- 朱熹，《易本義》，臺北：世界書局，1982。
- 朱熹，《易學啓蒙》，收入《朱子遺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第12冊。
- 杜預，《春秋左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
- 揚雄，《太玄經》，司馬光集注，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44冊。
- 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
-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刻宋本，北京：線裝書局，2001。

### 二、近人論著

-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1976 《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
- 文物編輯委員會  
1979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4-1994 《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 王明欽  
1996 〈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收入《一劍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八六屆畢業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李宗焜

- 2000 〈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發表於北京大學主辦，「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2000年8月19-22日。

朱德熙

- 1995 《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何澤恆

- 2004 《先秦儒道舊義新知錄》，臺北：大安出版社。

李大用

- 1992 《周易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家浩

- 1997 〈王家臺秦簡「易占」爲《歸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1。

李零

- 2000a 《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

- 2000b 《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

李學勤

- 1992 《周易經傳溯源》，長春：長春出版社。

- 1999 〈出土筮數與三易研究〉，發表於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主辦，「紀念聞一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1999年10月。後收入氏著，《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002 《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03 〈新發現兩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5。

- 2004 〈論戰國簡的卦畫〉，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6 《周易溯源》，四川：巴蜀書社。

肖南

- 1989 〈安陽殷墟發現「易卦」卜甲〉，《考古》1989.1。

季旭昇

- 1999 〈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經學研究會主辦，「《周易》《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9年5月8-9日。又收入《象術易學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3，第三輯。

屈萬里

- 1983 《先秦文史資料考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1984 《書傭論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 《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

邴尚白

待刊稿 〈葛陵楚簡中的卜筮記錄〉。

金景芳

1987 《學易四種》，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胡平生

1998 〈《阜陽漢簡·周易》概述〉，《簡帛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唐蘭

1957 〈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1957.2。

孫海波

1989 《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容庚

1989 《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荊門市博物館

1998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馬承源主編

200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明

1990 《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國家文物局

2003 《2002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

張亞初、劉雨

1981 〈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2。

張政烺

1980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4。

1981 〈易辨〉，收入《中國哲學·第十四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3。

1985 〈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北京）24。

2004 《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曹瑋

2002 《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李宗焜

郭沫若

1999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上海：上海書店。

(湖北省) 荊州地區博物館

1982 〈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1。

1995 〈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1。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

1991a 《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1b 《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黃濬

1937 《鄴中片羽二集》，北平：通古齋。

葉國良

1984 〈《博古圖》修撰始末及其相關問題〉，《幼獅學誌》18.1。

廖名春

2001 《新出楚簡試論》，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滕壬生

1995 《楚系簡帛文字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蔡運章

2004 〈商周筮數易卦釋例〉，《考古學報》2004.2。

龍宇純

1994 《中國文字學》，臺北：五四書店。

韓自強

2000 〈阜陽漢簡《周易》研究〉，收入《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北京：三聯書店。

2004 《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舉有、陳松長

1992 《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

O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Yin-Yang Yao*

Zong-ku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re is a type of inscription composed of numerical symbols found on antiquities either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or excavated recently. Contemporary scholars call these numerical symbols “numerical diagrams” or “divinatory numbers.” Scholars have long contemplated the meaning of these inscriptions. By applying a principle which “ascribed odd numbers to *yang* 陽 and even numbers to *yin* 陰,” Chang Cheng-lang (Zhang Zhenglang) 張政烺 associated these numerical symbols with the *I Ching* 周易. Nowadays most scholars agree with Chang’s perspective and scholarly works have center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his theory.

The earliest numerical diagrams were composed of numbers from 1 to 10. Later, numerical diagrams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Zhanguo period 戰國楚簡 consisted largely of 1, 6, and 8. The Qin bamboo slips from Wangjiatai 王家臺秦簡 consisted exclusively of 1, 6, and 8. Only the two numerical diagrams 1 and 8 remained in the *I Ching* found in the silk books from the Mawangdui tomb 馬王堆漢墓帛書. 1 became *yang yao* 陽爻 and 8 was stretched as *yin yao* 陰爻. Thus, the *yang yao* and the *yin yao* comprised the “*i* diagrams” 易卦. Most scholars have assumed that the numerical diagrams were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i* diagrams,” and that the “*i* diagrams” have 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numerical diagrams. This has been the current consens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the “*i* diagrams.”

I have extensively gathered materials o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re-examined the prevailing theory. By means of painstaking analysis and reasoning, I foun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the “*i* diagrams” was actually very limited and indeed lacked a solid, logical foundatio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did not correlate with the *I Ching*: Examples of the *I Ching* cited in the *Zuo Zhuan* 左傳 and the *Guoyu* 國語 showed no direct correlation with the numerical diagrams. Thus,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the “*i* diagrams”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subjective inference for the most part.

This article proves that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the “*i* diagrams” are actually two different systems with no inherent connections. Many scholars assumed that the numerical diagrams could be correlated with the “*i* diagrams” and they drew inferences from the words of the *I Ching*. Yet if the basi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umerical diagrams and the “*i* diagrams” were to be challenged, these inferences would have to be widely re-examined.

**Keywords:** numerical diagrams, *yin-yang yao*, *i* diagrams